

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孙振玉 潘忠宇

吕耀军
Lv yaojun
著

当代 回族 媒体 文化

Dang

Dai

Hui

Zu

Mei

Ti

Wen

Hua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孙振玉 潘忠宇



当代回族媒体文化

Dang
Dai
Hui
Zu
Mei
Ti
Wen
Hua

吕耀军
Lv yaojun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回族媒体文化 / 吕耀军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12
(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227-05571-6

I. ①当… II. ①吕… III. ①回族—传播媒介—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9661 号

当代回族媒体文化

吕耀军 著

责任编辑 杨海军 丁丽萍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王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2997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0 千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571-6/G·81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孙振玉

《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是宁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研究工作尚在进行之中,为了项目参与者能形成必要的统一认识,也为了将来读者能够方便阅读,现就本套丛书研究设计中遇到的问题,谈以下三点认识。

一、关于回族文化的名与实

一开始就把“回族文化的名与实”作为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关心它的人一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把回族文化理解为回族的文化或带有回族特点的文化,这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只涉及文化名称的解释,只涉及概念问题,而没有涉及文化事实。当我们试图把回族文化的名称与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再到现实中去寻找与名称相符的事实时,就会发现,这样的文化事实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什么文化事实是所有的回族人都认可的;即使像伊斯兰教信仰这样看似简单的事实,在不同的回族人群中,具体内容也不尽一样。其他任何一种回族文化现象,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回族文化的“名”与“实”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寻找原因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到,其实不仅回族文化的“名”与“实”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凡是地域分布比较广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原来这跟这些民族文化中存在着的更深层次的矛盾有关,这就是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民族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如回族伊斯兰

教信仰的情况,这后一种矛盾的存在更为普遍。

地域分布较广的民族中之所以存在着民族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矛盾,是因为他们虽说是民族文化(我们不反对这样认为),其实都是由许许多多的地方文化构成的。回族文化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文化,当我们说到这个文化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名称,而真正看到的文化事实却是各式各样的地方文化,文化的地方多样性远比民族统一性突出。而在文化的地方多样性中,我们又注意到,有许多文化内容或要素乃是借用而来的。从前,借用自相邻民族的情况多一些,如今,借用的范围则广泛得多,恐怕已到了无远弗届的地步。所谓民族文化的民族性,一般为民族比较研究关注的多一些,它从不同的民族都具有不同的文化假设出发,结果似乎为每个民族都找到了其独有而一致的文化特征。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则是文化内部观察的结果,是从不同的地方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这个假设出发,结果发现:对于分布较广民族整体而言的那些“独有而一致的文化特征”,其地方表现并不一样,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研究越是细致深入,就越是发现不一样。至于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民族文化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则跟文化变迁有关。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民族文化随时间而出现分化、变异是正常的。

我们绝不否认那些地域分布较广的民族拥有统一的文化名称,如回族文化,经验也足以见证:不同的民族其文化特点确实有所不同,文化是可以按民族来划分的,但这只是站在民族之外的角度上来讲的,是抽象思维的结果。一旦进入到这些民族的内部情况就不同了。回族文化的地方差异性甚至在我的回族文化课上都能体会得到。我的每一届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是回族,其中,不少人就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课堂上我发现,回族文化这门课,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是既熟悉而又陌生。因为来自回族,他们对这门课的总体感觉是熟悉的,然而,对于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却又是陌生的,原因是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甚至来自宁夏的不同地方。回族文化的这种地方多样性,与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在中国适应了多样化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环境不仅包括自然

环境,也包括社会和文化环境。正是环境条件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回族地方文化的复杂多样性。

所以回族文化研究必须关注这种地方多样性,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不是特别强调范畴分析,而是更加注重具体事实发现,注重细节式描述(格尔茨所说的“深描”)。在获取资料的方法上,则强调深入体验、观察和访谈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当然也鼓励研究者亲自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正像有学者所讲:“有一类搞民族志的民族学家,通常要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与他们研究其习惯的人们一起生活,一起交谈,并对他们进行观察。这一田野工作,为深入描述(民族志)这些人的习惯思想与行为提供以资料。”^①民族志研究也包含着理论的,也处处体现着洞见,只是它不是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而是事实的分类概括、经验总结。“民族志应该是特定社会的文化行为的理论。理论的正确与否,要看陌生者能否……以民族志为指导正确地预见到该社会的情形。”^②民族志研究特别强调理论与事实之间的互动。理论与事实相结合的叙事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夹叙夹议,“叙”是事实描述,为主要的方法;“议”是理论阐述,为重要的方法。所以,搞民族志研究的人,不仅要在描述上下工夫,也要发现对象的习惯思想和行为的模式(patterns),要回答问题,进行解释。“换句话说,搞民族志研究的人要描述某一具体人群的生活方式,也许还会对某些所观察的习惯做出解释。”^③

二、关于回族文化的当代建构

回族文化的“名”与“实”之间的矛盾,限定了文化事实的真实性是不能超越地方的,超越了地方,事实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此外,回族

① 见,Carol R. Ember, Melvin Ember and Peter N. Peregrine. *Anthropology*,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tenth edition, p7.

② 见,Marvin Harris.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p266.

③ 见,Marvin Harris.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p266.

文化事实的真实性还受到事物之变化法则的挑战。回族文化像所有文化一样,随时空条件而变化,不断地被建构,此时此地不同于彼时彼地,没有一个超越时空而永恒不变的标准摹本,也没有一个超越时空而可以用来辨别真伪的标准尺度。回族文化只是一个连续的创造。

历史地看,回族乃是在来华的穆斯林移民,尤其是蒙古帝国和元朝以降来华之回回移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她融合了诸多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国汉族的血脉与文化传统,正是这种高度融合的现象,成了回族文化之历史建构的显著特征。这期间,回回民众不仅坚持不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还依时空条件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推动其成功地适应中国的情况,这是回族文化之历史建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回顾起来,历史上曾有许多因素影响过回族文化的发展,其中,汉族因素是主要的,汉族文化对回族文化的影响堪称全面而深刻,今后仍将对其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回族和汉族文化在当代又都受到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影响,相比之下,汉族文化原有的影响力却已不如从前。如果说历史上回族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而有“汉化”之虞的话,那么,如今这一担心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因为,如今回汉都面临着西方化的影响。西方化代表着某种进步,各民族都乐此不疲!

当代回族文化的确正在朝着现代民族文化的方向发展,或者,正在进行着现代民族文化的建构。这就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文化建构和怎样建构?回答第一个问题与民族是什么及其价值存在有关。民族是自然产生的,当他们相遇时,又会自然产生出认同的民族意识。民族产生之后,相互间既可以借助客观特征的不同区别开来,也可以通过主观认同的不同而将这一区别强化,至于这些所谓的“区别”和“强化”,则又可以根据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利益诉求而加以操弄。所以,民族在当今成了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有意义的社会存在。民族的确是一种可资开发利用的资源,事实上也正在不断地被开发和利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空前增多,尤其是受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传统的民族特征却正在日益消失淡化,客观的民族

区别也日益难以维持,民族文化的同质趋向相反则日益明显,这就使得民族——无论是作为一般现象还是作为具体存在——这一人类社会特有的“物种”也处于消失的威胁之下,结果自然会引发人们的某种忧虑。不管是出于对本属民族的忠诚,还是出于对民族资源的珍惜,或者两者兼有,忧虑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那些传统色彩较浓的少数民族中,是能够见证其存在的。说到少数民族的忧虑,与其说他们是担心自己会被现代文化海洋所淹没,不如说是更担心被多数民族所同化。当前,正是面对着这样的局面,人们——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的人们,他们所能做并且正在做的,就是强化民族认同与加紧文化建构。

在当代条件下,由主观上的民族认同到客观上的文化建构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内在逻辑关联,这是因为认同需要有客观条件支持。这些客观条件如原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既有的资源正面临丧失而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通过恢复旧资源与开发新资源来获得满足,或通过恢复旧文化与建构新文化来获得满足。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经验中,尽管现代元素被使用得越来越多,但建构传统仍不失为一种通用的模式,其实,这在当代条件下也仍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模式。传统当然也是可以被选择的。说到回族,她所建构的各种传统中,伊斯兰教仍是首选,这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对于回族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中国汉族这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多数民族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彰显回族身份的,也就是伊斯兰教及其所决定的其他文化特征。中国改革开放后,回族很快全面恢复了伊斯兰教信仰,这集中体现在宗教场所(清真寺)的修建、宗教活动的恢复与宗教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诸多国外的元素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凸显,如阿拉伯式的建筑风格、国外穆斯林的服装样式等,当然也少不了国外伊斯兰思想的传入。

需要指出的是,建构传统作为当代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不仅在于传承民族文化,彰显民族认同,弘扬民族精神,还由于建构中不可避免地会加入现代文化元素,赋予传统的民族文化以新的

内涵,从而令其更加适应于当代社会。所以,当代各民族对于文化传统的建构,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是在回归传统,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更代表的是在告别传统,只是当建构的主体在走向新的文化发展之路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一些重要的、传统的、标明其民族身份和认同的“行头”而已。在当今时代,任何开放的民族(开放的民族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他们的精神世界都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的狭小空间,而是已进入到了人类现代文化的最广阔的领域,这是历史的发展潮流,是少数保守者无力阻挡的。任何开放的民族也都不会真正陷在是保留传统还是进步发展的矛盾泥潭中而不能自拔。每个民族骨子里都是现代民族!如今不是,今后也会是!至于以科技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目前不正在不同程度地被世界各民族建构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吗?虽然也许有诸多方式和特点上的不同,但由此而带来的各民族文化的同质趋向,却最终在所难免。此外,在当代文化的建构中,各民族之间还会同以往一样,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尤其是那些关系密切的民族之间。这一切也是当代回族文化建构所要遵守的通则,当然也昭示了它的发展前景。

三、关于回族文化的当代文化志

回族是中国的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少数民族,分散在全国各地,多聚群而居,西北的甘宁青为其重要聚居地。回族很早就与汉族交往密切,如今已普遍讲汉语,在文化上也深受汉族影响,但对伊斯兰教信仰却很执着。历史上,回族学者曾在明清之际,将外来伊斯兰哲学与中国的宋明理学相结合,创造了“回回理学”这一独特的学术传统,而今这一积极的文化创造精神又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在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时候,其民族文化的发展可谓迎来了又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我们组织编写《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在全面认知回族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及时地记录下这一发展,以此为后人留下一部当代回族文化志。

为什么称作当代回族文化志?这是为了区别于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历史文化志而采用的一种叫法,当代文化志以对话生态的文化进行实

地调查所获取的一手资料为基础。那么,文化志与民族志又有什么区别?这要看怎样区别民族与民族文化。如果回答说民族是民族文化的创造主体,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创造物,这肯定不会错,但过于简单直白。民族文化固然是民族的创造物,但它主要不是指外在于民族的创造物本身,而是指民族创造过程中已形成某种特定方式(习惯)的思想和行为及其意义,这才是关键之所在。文化代表着民族的本质属性。所以,民族文化志与民族志基本上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区别只在于量的方面。民族文化志在民族志范畴之下,是专门跟文化有关的民族志,我们也无妨称其为文化民族志。既然是民族志,那么,研究者就可以完全陌生地进入到民族生活场域(田野),无论是在传统的农村还是现代的城市,通过亲身体验、观察和访谈,使自己成为一个对某一民族(群体)的文化踌躇满志的知情者,从而成为一个有看法,有想法,而想写东西的人。然而,民族志的写作是很讲究的,格尔兹曾讲人类学最有特点的活动就是写作,这是因为,民族志的写作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完全个性化的,饱含着写作者的主观感受和他(她)们已有的专业经验,结果是每一部民族志文本都有自己的特点,是别人无法复制的。

在《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这部当代回族文化志中,我们共设定了16个研究主题,包括当代回族的生计、语言、教育、伊斯兰教派门宦、伊斯兰文化译著、伊斯兰法文化、媒体文化、建筑文化、养生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人生礼俗、文学、音乐、美术和体育等,基本上涵盖了文化的主要内容。这部文化民族志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田野调查发现 and 描述回族文化事实,在此基础上,还将进一步发现那些发生频度相对较高的事实(行为),即发现“模式”。任何一位研究者,只要做足够深入的田野调查,掌握足够真实的资料,发现或把握这些模式并不难。除此之外,研究还自然会做如下思考:为什么有些事实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等等,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解答,民族学称之为文化解释。发现模式和解释意义,将构成这部当代回族文化志主要的理论建构。总之,我们期待这是一套主要使用民族学田野调查资

料,充满丰富细节,力求真实可靠,不乏真知灼见的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在按着这样的目标进行研究设计时,我们还曾遇到过以下三个带有一定原则性的问题,现将有关思考的结果介绍如下:

其一,回族文化是指民族的特有文化,还是所有的文化?我们注意到,民族文化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民族特有的,一部分是与其他民族分享的。尽管如今人类已经进入到了全面交往的时代,纯粹的民族文化实际上即使不是没有,也是极为罕见的,但是,不同的民族,只要他们成其为民族,总还有一些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所特有的,在抽象的意义上为民族整体所独享。而且,这些特有的文化不是别的,就是他们的传统文化,并且是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如今的民族身份认同依靠的就是这些传统的、特有的文化,没有了这些文化,民族的存在将遭到置疑。所以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民族,一方面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都会义无反顾地奔向现代化,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极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如何在这两种文化中进行取舍呢?我们认为较稳妥的做法,应该是只要跟回族有关,不问文化是特有的还是分享的,都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原因是这样才符合如今的民族文化乃是在人们全面交往的环境中被创造的实际,同时,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映回族文化的全貌。

其二,如何对待不同地方的回族文化?回族人口的分布十分广泛,在全国范围内可谓处处为家。受这种分布状况影响,回族文化的地方差异性非常突出。这就提出了研究中如何对待不同地方的回族文化问题。我们的原则是,把西北回族文化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做重点深入的研究,其余地方的回族文化,则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下,有选择地被纳入进来。突出西北的理由是,以甘宁青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分布着接近一半的回族人口(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西北5省区的回族人口占全国回族人口的比率为48.69%^①),他们至今仍保留着色彩最浓的传统文化;

^① 虽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已经公布,但还见不到所需的详细内容。

而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回族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西北也比其他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由西北,研究的重心向外延伸首先是西部(包括西北),西部 12 省区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地区,是集中分布着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地区,其中的回族人口占全国回族人口的比率为 60.75%。在该地区的西南,云南回族以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等原因,是比较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再按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西部下来是中部,中部 8 个省的回族人口占全国回族人口的比率为 18.21%,其中以河南、河北两省为主要代表。东部 11 个省的回族人口占全国回族人口的比率为 21.05%,以山东、安徽等省为主要代表。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上述地区具体研究对象的选择,还必须按严格抽样来进行。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无法回避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回族文化研究的全面性问题;其实,这既是一个可以做到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做不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重点全面,如整部丛书的 16 个主题,就做到了当代回族文化的重点全面;还有,每个主题的次主题结构,也可以做到重点全面。根本做不到的问题,就是回族地方文化的全面,甚至连重点全面也做不到,因为面对那么多的回族地方文化,我们凭什么判断,哪个地方的回族文化是重点,哪些不是重点?! 既然做不到,我们只能做有限的地方,但真实不能打折扣。

其三,如何对待已有的回族文化研究成果? 回族文化研究早已有之,成果已非常之多,对于我们研究当代回族文化也很有用。然而,在使用原有研究成果的事情上,从来都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用得不好,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会出现剽窃之类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只要严格地坚持这一点,剽窃应该不是特别担心的。我们所担心的,是回族文化不仅有很大的地方差异性,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凡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其发表之初就都已成为过去式,离当下活态的回族文化是渐行渐远,更何况还有彼地的回族文化不能张冠李戴地认同为此地的回族文化问题。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对待已有成果应持如下原则:将以往研究揭示出来的回族文化现象作为有用的线索,引

导我们开展研究工作,必要时将其还原到调查地点,验证其是否还有存在,若仍然存在,就可免除我们重新发现的辛苦。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确保我们研究的真实性,即使研究的结果被证明早已为以往的研究所发现,那么我们的贡献就在于证明了所揭示的文化现象今天仍在某地存活。

中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传统,虽然那主要是指修地方志,但也适合拿来说明我们编写这部《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的情况。我们选择这个时候来修这部文化民族志,也是欣逢了回族文化发展的空前盛世。何止是回族文化,当前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空前盛世,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空前盛世!

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见证中国时代!

孙振玉

2011年7月30日

序 言

2010年冬天,欣闻学院要以宁夏大学“211”项目“西部地区回族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为契机,编著一套《中国当代回族文化研究丛书》,内容涉及回族服饰、音乐、教育、译著、生计、法律、建筑、语言、文学、养生和媒体等共计15本书籍,以全面介绍当代回族生活各方面的变迁和发展。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因为现在动辄三四万的出版费,常使想搞科研的教师们陷入窘境。现在有专门项目资助出书,何乐而不为呢!另外,这本丛书与我所学的专业相近,我想更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所以,我积极申请加入这个研究团队。在其后的题目选择上,我选择了回族媒体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出自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代很多学者多是研究回族的历史或人物,现实问题研究较少。无论承认与否,在现实生活中,穆斯林生活确实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化的发展,社区的变迁,带来回族穆斯林族群各方面的深刻变化。所以,本人认为,比起纯理论的研究,这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更具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回族媒体文化的研究,目前国内仍然没有专门性的著述,这正是学者们在课题研究中希望发现的一个“空档”。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极具挑战性,这种挑战性也是我所喜欢的。加之,媒体研究多关注的是刊物、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等,这也符合我的个人兴趣和工作性质。我可以在办公室、家里潜心研究各个网站,涉猎各个网站的帖子,遍读各种刊物,基于以上原因,我欣然承担了这本书的写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计划在内容安排上,按照杂志、网站、媒体人、媒体读者和媒体伦理作为本研究的基本格局,然后每个项目下分别找几个典型案例分析之。同时,意图把腾讯QQ群、微博和微信这类社交聊天工具也作为研究内容之一。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却发现,这样做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诸如QQ群和微博此类形式,是个人作为私人小团体学习交流或社交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私密性,不喜欢随意加不认识的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人做好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其中也看不出回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之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就放弃了这一块的研究。同时,原打算把媒体读者作为一个调查对象,设想从媒体人,通过媒体载体,到媒体读者,以及其间产生的媒体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环节。在写作过程中,我从一些主编和读者处了解到,对于网站的读者或受众者来说,相对来说好统计。通过站长统计的方式,就可以了解该网站读者群体的分布地区。但是,对于回族刊物,特别是回族民间刊物而言,这些刊物主要是以赠送为主,读者的被动性比较大,寄去的刊物或许并没有被打开,或者即使打开,也并不见得会仔细阅读。鉴于这些刊物缺乏一个稳定的和具有主动性读者的现实情况,我就打消了以读者为调查对象的想法。所以,本研究主要是以回族刊物、回族网站、媒体人和媒体伦理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其他一些新的情况。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是回族媒体研究,我想至少研究对象应该是回族这个族群,或者说媒体创办者,以及媒体受众者应该均为回族;但在研究中发现,问题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例如,在回族当中影响较大的网站和刊物中,有的主编或站长是汉族穆斯林。鉴于该网站或杂志在回族穆斯林当中的影响力,我仍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又如,有的网站或民间刊物在我最初研究的时候是存在的,然而,当研究进行到一大半时,突然该网站或刊物消失或不刊发了,这使我唏嘘不已。但作为曾经客观存在的刊物,我仍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这或许反映了中国回族媒体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吧!再如,回族刊物或网站,并不常常把自己定位为纯粹回族的

刊物或网站,而是强调伊斯兰教的共性,刊物或网站常常是以“中国穆斯林”或“中国伊斯兰”等词汇为核心词,但是因为这些刊物事实上主要影响的是回族穆斯林群体,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网站或刊物也往往是由回族穆斯林主办的,所以,它们也是回族媒体研究的对象。

在此书的写作和调查过程中,遇到很多小插曲,我常常感叹这是“巧遇”呢,还是宗教里所说的“前定”。例如,在山东大学举办100周年校庆之际,受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傅有德先生邀请,我去山东济南参加宗教学术会议。机缘巧合,因为会后跟错了吃饭的队伍,跟随宁夏社科院的马平先生来到了另一个餐厅,这里一些山东的穆斯林学者正在等待开完会的马平先生,准备宴请他。在这里,我碰到了自己一直想找的《济南穆斯林》编辑部的马明先生,并在后来得到他的无私帮助。还有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参加“非统/非盟五十年与亚非合作”学术研讨会期间,我顺便调查了天津市天穆网网站。周末,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天穆村。然而下车后才发现,这里已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居民区。又是在一系列的“巧遇”和好心人的帮助下,我联系到了“天穆网”的主编,顺利地完成了调查。所以,这本书稿之所以能最终完成,是在很多的“偶然”的情况下,在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在调查过程中,有时因为地域的限制,也不得不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媒体人交流。这其中包括《中国穆斯林诗书画》的主编马石头先生,《穆斯林通讯》的主编马中笑先生,《高原》杂志的黄保国先生。好在因为研究的是他们的网站或刊物,所以通过先研究他们的网站或全部刊物,然后了解他们创办网站或刊物的理念。

因为我不是专职研究人员,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是我每天生活中的三部曲,所以,这部书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利用寒暑假时间,或借外出开会的机会,通过调研完成的,因此,也舍弃了很多东西。犹记得在2012年春节之际,没有回家看望母亲,仍坐在电脑前整理访谈笔录,统计刊物论文发表情况;犹记得在给计划研究的刊物发送电子邮件后的焦急等待,以及拟调查刊物对我想调查其刊物的婉言谢绝,以及在酷阳

之下,一个人背着大包在北京牛街寻找资料时的情景,现今仍然历历在目。其中经历的酸甜苦辣,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过程都是我人生的一种磨炼,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突然感觉到还有很多问题应该去研究。这些在研究中发现的新问题,或许是我以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作为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对促进文化交流和社会和谐所应尽的义务吧!

勉强写出上面的字句,就当作对这两年所经历岁月的怀念吧!

吕耀军

2013年5月22日